



1898年那场

未遂政变

马勇
著

改革进入深水区，光绪、康有为
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面临重重阻碍……

著名学者马勇带你走进1898年的中国故事，
比《纸牌屋》更精彩，比《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具现实意义！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那场

未遂政变

马勇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 / 马勇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14-15638-9

I. ①1… II. ①马… III. ①戊戌变法—研究 IV. ①K25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89747号

书 名	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
著 者	马 勇
责任编辑	朱 超
装帧设计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	书情文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407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2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5638-9
定 价	49.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拉开政治变革的帷幕 001

外交难题与内政改革 002

胶州湾外交事件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潮 / 康有为在北京上《上清帝第五书》 / 光绪开始考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官场来了个年轻人 009

康有为差点离开北京返回家乡 / 康有为在西花厅接受总理衙门诸大臣问话 / 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 / 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抗衡激进改革派 / 《劝学篇》客观上促进了康有为激进改革的进程

激进与保守：中国政治的古老话题 026

康有为开学会，以推动政治发展 / 保国会的成立及其引起的斗争 / 5月29日恭亲王的逝世使政局更加复杂 / 恭亲王离世后，康有为、翁同龢积极推动政改 / 光绪、慈禧酝酿政治改革 / 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百日维新开始

政治变革悄然发动 044

朝廷罢免翁同龢，改组内阁 / 翁同龢被罢免的原因 / 康有为的终南捷径 / 荣禄与康有为的谈话及对康有为的态度 /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 / 光绪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第二章 改革共识与差异 069

废八股还是废科举 070

从察举到八股 / 对科举制的思考，及开设特科的建议 / 康有为为废科举攻击所谓守旧礼官，开启了新旧党争

一个可以适可而止的新科举方案 084

康有为等更彻底地改革科举制的建议被采纳 / 科举改革引起的情绪。张之洞等新提出的更稳健方案得到落实 / 康有为不满稳健的科举改革方案，矛头指向慈禧

京师大学堂：新政第一大举动 095

关于新式教育体制的讨论。酝酿建立京师大学堂 / 清廷最终决定创办京师大学堂。李盛铎的五点建议 / 总理衙门提出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四项原则，梁启超执笔京师大学堂章程

话语权、控制权与利益关切 108

京师大学堂筹建，各方达成基本共识 / 康、梁设计的大学堂权力框架，把孙家鼐推向了康有为的对立面 / 梁启超与译书局风波

第三章 维新阵营：内部争斗与外部冲突 125

洛阳纸贵：《时务报》的成功 126

《强学报》停办，汪康年有意创办新刊物 / 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共同创办《时务报》，大获成功 / 汪康年与梁启超出现裂痕 / 《时务报》“三驾马车”冲突再起

无法共富贵：《时务报》的内部争斗 144

梁启超与汪康年的决裂 / 康、梁试图用行政权力夺回《时务报》，却被孙家鼐反制 / 孙家鼐与康有为的斗争 / 汪康年与梁启超等的舆论战 / 《时务报》争夺战未已，康、梁等流亡海外

湖南新政：中国新希望 159

湘军在甲午战场的惨败，刺激湖南人及陈宝箴锐意求变 / 谭嗣同、唐常才等湖南民间维新力量创办算学馆 / 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

谁是湖南新政的终结者 174

梁启超入主时务学堂，受到湖南各界欢迎 / 梁启超在学堂大肆宣讲异端思想 / 谭嗣同等创办南学会，与时务学堂一起成为湖南新思想的中心 / 湖南知识界对新学态度的转变 / 在湖南知识界的攻击下，南学会停止，时务学堂改组

第四章 党争与利益集团 195

王照上书：无关乎新旧 196

清廷开放部分言论，为王照上书提供了机会 / 王照上书，指涉光绪与慈禧的权力关系

罢免礼部六堂官 201

王照上书受阻，遂弹劾礼部长官 / 光绪处分礼部六堂官，加剧了政治高层的分化

超常提升四军机章京 207

光绪破格提拔谭嗣同等有维新背景的年轻人为军机章京 / 四章京与原有章京、军机王大臣的矛盾，加剧了政治层面人事的分化

伴食宰相与宠臣斗法 217

9月7日李鸿章被解除实职，为事态发展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 甲午战后，张荫桓、李鸿章相继代表清廷与日本谈判

外交调整：党争的外部资源 231

张荫桓地位上升，引起李鸿章、翁同龢的怀疑与嫉恨 / 因借债事，张荫桓与李鸿章等同僚关系日趋紧张 / 张荫桓以为两宫冲突，选择站在光绪的阵营 / 支持维新派且亲英日的张荫桓地位上升，亲俄的李鸿章出局

第五章 改革步入深水区 249

制度局：废我军机？ 250

康有为等人对于清廷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 康有为设制度局以统筹维新事务的设想获得光绪认同 / 在慈禧的支持下，总理衙门全面否定康有为创设制度局的构想 / 光绪对总理衙门的驳议不满。官制改革的流言造成官场恐慌

懋勤殿：夺我大权？ 263

军机大臣全面而有力地反驳了康有为的政治改革设想 / 康有为等建议开设懋勤殿，遭到阻击

裁撤冗署与冗员：官场大地震 271

岑春煊提出大规模裁撤冗署冗员，康有为并不赞同 / 光绪悍然下诏裁署裁员，引起官场一片混乱 / 张元济等维新派反对朝廷提出的安置被裁撤人员的方案 / 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失控，政治局面失去稳定

第六章 各路英雄会京城 291

一个传说引发的政治恐慌 292

在众多官员建议下，光绪决定于内廷设置懋勤殿 / 康有为积极活动，谋求入懋勤殿人选。康有为等人认定光绪与慈禧意见不合

等待伊藤 300

伊藤博文来华，引起朝野各方的关注和期待 / 伊藤在天津逗留数日后，乘专列抵达北京

李提摩太来了 308

康有为提议李提摩太邀请伊藤来华 / 李提摩太是康有为等维新派与日本人、英国人的桥梁

袁世凯进京 312

康有为拉拢袁世凯，想使之成为所谓帝党的军事力量 / 王照竭力反对利用袁世凯以武力手段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绿林好汉也来了 321

谭嗣同开始相信帝后之间存在矛盾 / 谭嗣同召集绿林好汉进京，以应付想象中的政治危机

第七章 想象冲突与冲突想象 327

杨锐建议成了政局转变的关键 328

光绪与杨锐讨论内廷问题，并手谕密诏 / 杨锐建议改正康有为激进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也获得了林旭认同

康有为铤而走险	337
---------------	-----

毕永年被迫参与康有为等人的军事冒险计划 / 光绪督促康有为早日离京，反促使康有为坚定军事冒险计划

政局变动中的日本因素	347
------------------	-----

伊藤博文与清廷高层的互动 / 康有为拜访伊藤，想通过他调和所谓两宫矛盾以赢得时间

第八章 破绽在哪里 361

刀逼袁世凯	362
-------------	-----

袁世凯获破格提拔。因英舰事，荣禄召袁世凯回天津 /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逼袁世凯表态

皇太后突然回宫	373
---------------	-----

杨崇伊建议慈禧训政 / 慈禧回宫的真正原因

康有为悄然出走	379
---------------	-----

康有为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让英国干预当前的政治危机 / 康有为悄然离京

第九章 政治转折关键点 385

其实没有谁告密	386
---------------	-----

袁世凯见光绪，暗示康有为等人不可靠 / 光绪接见伊藤博文 / 袁世凯告诉荣禄谭嗣同对自己的夜访

重建垂帘体制	393
--------------	-----

慈禧回宫，与光绪讨论英俄冲突、杨崇伊奏折等事 / 光绪遵慈禧建议，下令逮捕康有为兄弟

“多余的话”：康广仁究竟说了什么	398
------------------------	-----

杨深秀上书要求调袁世凯军队入京勤王 / 康广仁等被捕，康有为的阴谋逐渐浮现

第一批抓捕 ————— 403

在光绪的请求下，慈禧回宫训政 / 张荫桓、杨锐等成为第一批被惩处的人

第十章 政治清理：为了再出发 415

国际干预：挽救张荫桓 ————— 416

因英、日交涉，亲英日的张荫桓逃过一劫 / 盛宣怀等建议对张荫桓从宽发落

诛杀六君子 ————— 423

荣禄入主中枢，光绪病情加重，慈禧垂帘听政 / 为尽早化解政治危局，釜底抽薪，杨深秀等六人被匆忙问斩

清查与防止扩大化 ————— 430

康有为事件后的人员处分与人事变动 / 百日维新被全面调整，但不是全面废除 / 守旧者的倒退被遏制，稳健的改革派掌控改革进程

黑暗终归会过去 ————— 440

康有为的出走路线 / 在英国人的庇护下，康有为躲过清廷追捕

第一章

拉开政治变革的帷幕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痛苦的历史记忆。问题是如何面对这种苦难，是从
此消沉、堕落，还是奋力改变？

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第二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人的痛苦记忆。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更不能赢得国际的尊重，中国必须改变先前三十多年的发展模式，必须逐渐消除、减弱自己的特色，逐步与世界同步。知耻而后勇，这是中国圣人的教诲。中国在经历了空前的奇耻大辱之后重新起步，追随对手走上维新道路，仅仅两年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改变，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巨额资金砸到中国，中国经济地图日新月异，中国人信心倍增。

外交难题与内政改革

胶州湾外交事件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潮

此时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良性态势，外国资本之所以看好中国，是因为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政治改革方面的尝试，试图为国家提供一种长期稳定的保障，湖南的维新运动、各地的新政实践，都充分表明这个古老的国家在经历了大失败之后的大觉醒。

然而，一片升平景象中突然出现一个尴尬，一个外交难题突然而至。而此时的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还像一个雏儿。

这个外交难题来自德国。德国在这之前确实有恩于中国，那是它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联合俄国和法国，逼迫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割让，尽管中国为此增加了一笔三千万两的“赎辽费”，但毕竟保全了中国本土。

不过，三国干涉还辽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三国都觉得自己有恩于中国，中国应该对他们的贡献给予回报。于是德国人向中国提出租借胶州湾；俄国人诱逼中国签订秘密条约，逐步使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沙俄势力范围；法国人不甘落后，也提出与德国差不多的要求。

中国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民族，从来不会忘记在危难中帮助过自己的人。特别是考虑到中德贸易额迅速增长的事实，大致同意德国在东部沿海找一个地方建立储煤屯船的海军基地，一是有利于保护中德之间的商业往来，一是有利于远东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均衡。只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官僚主义太厉害了，中德之间就这个问题的谈判一拖再拖，严谨的德国佬终于忍耐不住了，决定利用或者制造借口，强行武装占领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方面答应。

这场外交游戏当然需要冠冕堂皇的借口。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害，这终于为德国人提供了绝佳借口。德皇威廉二世获悉这一消息后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反而情不自禁地感谢中国人为他们提供了理由，迅即下令德国远东舰队不惜代价占领胶州湾。

11月13日，德国舰队向胶州湾中国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在48小时内全部撤退。巨野教案的是非曲直不必讨论，两名传教士死亡确实是个问题，清政府碍于此点无法强硬以对，况且中国刚经历过甲午战争，此时也真的无法轻启兵衅。清政府一方面寻求列强帮忙劝阻德国人，一方面下令清军镇静以待，不要让德国人寻找新的理由。

清政府的忍让并没有阻止住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的步伐，而俄国人在清政府的请求下，先是答应劝阻德国人，继则与德国人合谋，狼狈为奸。俄国舰队于1897年12月15日占领了旅顺和大连湾。

德俄两国的不义之举无疑是中国的外交失败，特别是俄国刚刚与中国签订过密约，保证中国二十年无事，现在自己动手将三国干涉还辽要回来的大部分东西重新拿走，这不仅使中国政府极其尴尬，也使吐出这块肥肉的日本人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中德、中俄之间的秘密外交，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获悉，《国闻报》立即发表言辞犀利的政治评论，批评德俄两国政府的强盗逻辑，进而批评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调中国的出路只有加快政治改革，急谋自立之道，紧随世界潮流。只有自立，才能救亡；只有自身强大，才能谋取和平，以战止战。

《国闻报》的政治评论主要出自严复之手。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监督，严复对甲午战争有着常人所难以理喻的情结。他的同学、学生，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这次战争，所以他不仅密切关注这场战争的每一个进展，而且在这场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大受刺激，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檄文，探讨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并着手翻译《天演论》，期待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促使中国人从迷梦中惊醒。所以当德国、俄国背信弃义，用强力掠夺中国，强占胶州湾、大连湾和旅顺口时，严复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愤怒，再次拍案而起，挺身而出。

严复激烈的政治言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南方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同样具有亡国的幻灭感，他们甚至试图改变湖南维新运动的性质，以为亡国之后图，计划假如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以湖南为基地策动南部中国独立，为将来的民族重生奠定基础。

亡国的幻灭感促动了政治激进主义迅速崛起，梁启超开始以时务学堂为基地宣扬政治变革，以为中国君主权力日尊过盛，人民的政治权力日衰递减，可能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对症下药，中国的政治变革就是要扩展人民的政治权利，

还政于民，像西方那样设立议院，约束君权，限制君权。梁启超甚至还与学生们讨论改正朔易服色也就是改朝换代的可能性，这在正统思想者看来无疑超出了大清王朝的政治纪律。

梁启超的异端思想并不是孤立的奇思妙想，这里既有其师康有为思想异端的学理根据，也是梁启超那批朋友曾经讨论过的问题，谭嗣同明确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君主专制，两千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独夫民贼”把持政权且无所约束，所以他号召中国人冲决网罗，废君统，倡民主，建设和西方一样的近代国家。

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激进主义深刻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进程，湖南新政由先前比较单纯地发展近代经济向政治体制改革转变。课吏馆、保卫局等一系列新机构逐步设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官体制、警察体制开始尝试。因胶州湾事件刺激而创办的南学会，则逐步发展成一个地方议会组织，以为将来中国大局发生危险时，能使湖南像日本幕府末年的地方势力一样，强藩联合，推动全国进步和民族重建。

湖南的政治激进主义后来引发许多不必要的政治冲突，原本受到湖南各方面欢迎的梁启超简直是被驱逐出境。好在梁启超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湖南，追随其师康有为重回京师大展身手去了。

康有为在北京上《上清帝第五书》

胶州湾事件发生时，康有为正在北京。他此次北京之行虽然不是为外交危机而来，但他对政治的天生敏感和热情，使他很快因胶州湾事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康有为利用自己的人脉，与政治高层广泛接触，他虽然与这些政治高层有着地位上的悬殊，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他们发表对这些外交危机的看法，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康有为曾就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向清政府表达过意见，那几次上书虽然都没有取得具体效果，但康有为的名字在京城官场似乎并不陌生。所以，胶州湾危机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难题，但对康有为来说，无疑因此而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据他后来描述，胶州湾事件确实给他极度脆弱的心灵以致命打击，爱国保种之心油然而生，深夜中常常暗自流泪，仰天痛哭，并奋笔疾书，草就一份建议书，坦率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康有为并没有就事论事探讨胶州湾外交危机的处理方式，而是从国际大背景详尽分析中国的处境，从政治的

高度为中国指点未来出路。康有为认为，甲午战后三年来，列强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但也产生了某些忌妒或遏制的心理，因而在西方国家中，一个重要的舆论就是谋划怎样瓜分中国。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真正危机。

基于这种判断，康有为认为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只是西方国家瓜分中国的第一步，是给西方国家提供经验。德国如果因此而成功，那么势必激发其他国家起而仿效，中国必将面对列强更大的压力，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康有为郑重警告清廷主政诸公：列强计谋得逞，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根据康有为的分析，尽管中国在甲午战后，在度过了难得的三年“维新时代”之后，依然不被列强视为一个正常国家，依然被他们任意欺凌，主要还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弱昧”，尤其是愚昧无知，不知天下大势，不知变法图存，得过且过。结果，中国经过了三年“维新时代”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被人瞧得起：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不举，所闻日孤，有援难恃。凡此，都是中国大病根。

知道了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康有为当然比较容易提出自己的治疗方案。他的基本意见是中国的外交危机不要机械地从外交上找原因，而应该打开思路，从内政上找出路。中国不能在内政上、在政治上有办法，不能练好内功，不能使中国尽快以民主国家的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那么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处境依然不会改变，中国依然是被欺凌、被侮辱的对象。

以这个判断为基础，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因应胶州湾危机所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尽快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激励人心，次明耻以提振士气。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改革政治制度，一意维新。中国只有在政治上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中国只有建立与东西洋各国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制度，才能使东西洋各国以平等兄弟之国的身份待我。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优越性不是要建立与东西洋各国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在同一或近似的制度框架下保留民族的独特的文明形态或生活方式。为此，康有为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焉者取法俄国、日本，以定国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重现近代国家，从制度上奠定近代国家的基础；

中策则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集思广益，实行变法，次第施行；

下策是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以本地情形各自变法，以局部试验为全国变法提供经验，或者干脆就是强地方弱中央，弱干强枝。

康有为自信，实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能行中策，中国还可以维持积弱的局面；仅行下策，我大清王朝或许依然受人欺凌，但也不至于灭亡。总之，不论大变、中变还是小变，中国必变则是唯一的选项。

按照清廷规则，康有为虽然自1895年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之后并没有在工部上班，但他的编制上依然保留在工部，因此这份上书要想呈递政治高层，要想让皇上看到，就必须通过工部主管这一关。

不料工部尚书崧淮在读到康有为文中“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时，虽然感同身受，以为康有为说得真好，极为痛心，极为真诚，但无疑具有一点“犯上”倾向，有点政治上的不正确。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是，胶州湾外交危机在崧淮等政府诸公看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交事件，往重了说也不过是德国人过于霸道，有点欺负中国。这件事就事论事，就是中国国力不如人，似乎无需上升到什么政治层面，更无需怀疑刚刚确立的维新路线。康有为的文章虽然写得好，话也说得透彻，但总觉得有点夸大了胶州湾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所以崧淮不愿以工部的名义转递康有为的这份上皇帝书。

崧淮恐怕再没想到他不愿转呈的这份上书日后会搅起一场什么样的历史风波。

崧淮字寿泉，满洲镶蓝旗人。原为翁同龢任工部尚书时的属员，据说是翁同龢一手提拔起来的。翁同龢获知康有为上书的情形后，他当然有办法将这份上书直接交给皇上。但翁同龢不想这样做，他觉得要想这份上书达到应有的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正常渠道报送皇上，所以他凭借自己与崧淮的交情，先后两次到工部与崧淮交涉，作疏通工作，劝崧淮按照程序将康的这份上书转呈。或许是崧淮受到其他更高层面的压力，或许是他真的认为康的这份上书没有多少价值，总之他硬是不给翁师傅面子，就是不愿以工部名义转呈这份文件。

康有为的上书没有通过正常渠道上达天听，但在京城内外却广为传抄，开明官僚和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大致认同康有为的危机意识，能够从胶州湾事件中发觉政府的既定方针可能需要修正和调整，而守旧或正统者似乎认为康有为危言耸听，夸大危机，中国决不能如此朝三暮四，得陇望蜀，好高骛远，而必须坚守三年来的维新共识，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外交问题归外交，内政问题归内政，按部就班，稳扎稳打，向着既定目标迈进。

很显然，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主张并没有很快成为知识界、思想界、政治界的

主流意识，稳健的、有步骤的维新运动似乎依然是朝野基本共识。心灰意冷的康有为深切感到偌大的京城竟然没有多少政治知音，于是他准备离开令他失望的京城，返回故乡继续自己的事业。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临行前，康有为在向各方面辞别的时候，有意无意中在其弟子梁启超的好朋友曾习经的陪同下拜访都察院主管徐寿蘅。死马当做活马医，康有为顺便将他的这份上皇帝书送给徐寿蘅一份，同时自然中流露这份上书的遭遇。徐寿蘅的政治理念比较保守，工作作风比较持重，特别是由于职责所在，总是显得无私无畏，并不像工部尚书崧澐那样畏首畏尾，胆小怕事。他看了康有为这份上书，并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反而认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于是签发报送皇上。

皇上看到这份文件后，并没有像崧澐所预想的那样感到不愉快、不舒服，而是非常高兴，以为这份上书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与自己的许多想法暗合，于是欣然接受，责成总理衙门安排召见。康有为的命运由此彻底改变。

康有为的奏折高屋建瓴，大气磅礴，与技术官僚就事论事处理外交事件风格显然不同，这一点在技术官僚看来或许文不对题，驴唇马嘴，但在皇上看来，却甚合心意，不能不引起皇上的思考。

无独有偶。如果满朝文武百官只有康有为一个人这样看这样说，不论这种说法多么动听，无论皇上怎样喜欢，恐怕都难转为政治实践。巧得很，1897年12月30日，杨深秀被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第二天，杨深秀就向朝廷递交了一份《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奏折的基本思路竟然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出奇的一致。

杨深秀认为，自1895年以来的维新运动确实意义非凡，成就巨大，然而这三年“维新时代”所呈现的问题与之前三十年洋务新政的问题相类似，依然是只变其末，未变其本，所以才有了胶州湾事件这样的“外交困难”，才有德、俄、英这些国家不按常理出牌。杨深秀的分析与康有为的一样，自然很难获得主政诸公的认同，但对那些“政治边缘人”，或“政治新秀”，或“权力失落者”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是批评现实政治的一个绝佳借口。所以，杨深秀的奏折一提出，就引起政治高层的极大反响和震动，这毕竟是因胶州湾事件而引发的“外交困难”竟然推导出政治变革的结论，这实在有点惊天动地，预示着新的一年不可能依然如往昔那样风平浪静、浑浑噩噩。

光绪开始考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皇上和诸位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三年来未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他们真的以为中国在甲午战后知耻而后勇，发愤有为，三年大见成效了呢？杨深秀的“盛世危言”无疑深深刺激了皇上和他的“众爱卿”。痛定思痛，皇上在将这份奏折上报给已经退居幕后颐养天年，但依然不辞辛劳为大清王朝政治决策负最后责任的慈禧太后过目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1898年1月16日，皇上在召见群臣时谈及外交困难和时事，询问众爱卿在这诸多困难中，究竟应该以什么事为先。皇上在作这种设问时当然已有自己的答案，他接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应该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以变法为急务，而不是就事论事，整日忙于具体事务，而不明世界大势、中国大势。

皇上的这些说法可能太突然了，各位重臣多日来已为胶州湾事件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心思去考虑什么政治改革，什么变法图存，更何况诸臣并不一定认同杨深秀、康有为这样的说法，因为胶州湾事件并不意味着过去三年所确立所执行的维新路线有什么错误。胶州湾事件只是一个外交事件，并不应该将一个外交事件夸大成一场政治危机，更没有必要上升到生死存亡这样的高度。所以，众卿在听到皇上的这个指示后，默然无对，即便是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吞吞吐吐地表示，要说进行什么改革，恐怕还得从内政改革做起。

众爱卿一时跟不上皇上的思考，这也难怪。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所有的臣僚都不过是执行工具，无需思考，更不需要独立思考。他们只是在被动接受皇上的指示，然后再想法落实皇上的指示。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皇上通过胶州湾事件感觉中国可能需要一场政治变革，主要是受到康有为、杨深秀这样的“政治边缘人”或政治新锐的思想刺激。这种带有异端的眼光很难在成熟的、既定的官僚体制中发生。

皇上政治变革的期待没有很快在政治高层获得回响。不过，年轻的皇上并不会就此放下，更不会就此甘心。他在退朝后责成翁同龢起草三道上谕，一是要求改进中央政府各衙门的办事作风，提高效率；二是要求各省督抚切实淘汰冗员，举荐人才，开创新局；三是要求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快筹款开办制造局厂。总之，皇上期待中国能够在内政方面有办法。

杨深秀的建议与康有为上书的政治主张出奇的一致，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史阙有间不可妄加猜测。研究杨深秀的人大都认为这是杨的独特见解，而研究康有为的人，或以为这个主张来自康有为的启示，或者干脆就是康有